本版编辑：史小今
E-mail：m2@studytimes.cn
Tel：010—62804757

热点透析

萨迪克如何登上伦敦市长宝座

□ 宋雄伟

1997年，英国政府在地方治理上开始了以“放权”（Devolution）为核心的系列改革，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有了更大范围的自治权，成立议会，可以因地制宜制定适合本地情况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在这一轮放权运动中，伦敦同样也选择了新的治理体系和结构。1998年，根据宪制改革安排，伦敦市民举行了全民公投，同意设立一个拥有直选市长和25名议员的大伦敦市议会。2000年5月4日选举产生了第一届市议会和第一任大伦敦市长。

伦敦市长选举使用“补充投票”（supplementary vote）的选举制度产生。选民选出他们首选和第二偏好的候选人，如果没有候选人获得半数以上的首选投票，则前两名直接进入第二轮，并重新分配选票。大伦敦市议会（London Assembly）有25个议席，伦敦市长的施政行为受到大伦敦市议会的监督和审查。新选举产生的大伦敦市议会中，14个议席分别属于工党和保守党，其他11个议席则分配给了绿党、国家民族党和自由民主党。伦敦市长并不是全能市长，主要在治理交通、宣传文化、治安、就业和经济发展几个方面承担主要责任。其他领域的政策则需要密切地与中央政府所颁布的政策相互配合。

2016年5月5日，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对这一天都备加关注。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年仅45岁的萨迪克以56.8%的支持率击败扎克（43.2%），成为欧洲大都市中首位穆斯林市长。笔者认为，多元包容的制度和文化，正向化“穆斯林标签”，汲取工党大选失败教训，亲民务实、草根形象的竞选策略，稳健的公共政策方案，以及争取少数族裔的选票，是萨迪克成功当选的重要因素。

多元包容的制度和文化

今天的伦敦是全世界人口和文化最多元的城市之一。根据官方公布的最新人口统计数据，在伦敦，大不列颠白人仅占45%，非不列颠白人约15%；其次为印度人与黑非洲人，各占7%，巴基斯坦裔占伦敦总人口的3%左右。这样的结果得益于英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元包容的制度和文化。萨迪克能够当选，最重要的原因应该归功于伦敦多元包容的城市文化，这种文化的形成与长期以来各种族裔能够和平共处、互相尊重、相互包容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也与政府在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上的多元包容密不可分。萨迪克正是生长在这个城市中，在这个城市接受了基础教育，享受了良好的公共卫生服务，住上了政府提供的廉租房，更有机会作为英国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和政治生活。他在35岁就当上了代表TOOTING区的国会议员，并在39岁成为英国第一个穆斯林内阁成员，任当时工党布朗政府主管社区事务的国务大臣，之后又成为交通部长。这样多元包容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真正意义上为萨迪克的当选奠定了最根本的基础。这位巴基斯坦移民的后代和巴士司机儿子、政府廉租屋里走出来的萨迪克最终以压倒性的选票优势，击败了竞选对手——亿万富翁的儿子、代表英国保守党的候选人扎克。

正向化“穆斯林标签”

伴随着最近的难民潮，以及欧洲各国由极端穆斯林分子制造的暴力恐怖袭击，使西方世界对穆斯林的标签化形成根深蒂固的印象。因此，在许多人看来，作为穆斯林的萨迪克想成为市长是不可能的。竞争对手保守党的扎克更加认为“布拉德利效应”（Bradley Effect）会发生在这次市长竞争中。即：表面上看起来，萨迪克支持率的民意调查远远高于竞争对手，然而，实际上在最后真实投票中，人们会受到“穆斯林标签”的深刻影响，与在民意调查时的投票选择相反，更加慎重地将选票投出。萨迪克在竞争中非常巧妙地处理了这个问题，一方面，坚持自己的信仰，严于律己；另一方面，又抛出了希望，让穆斯林来解决穆斯林的问题。首先，萨迪克并不讳言自己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表明自己非常忠实于伊斯兰信仰，如对每日祈祷仪式严格遵守、斋戒、从不喝酒、没有婚前性行为等。实际上萨迪克同时也是在向所有选民展示自己的良好品德和严于律己的行为方式，表明自己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候选人。其次，萨迪克在面对“穆斯林标签”的质疑中，沉着冷静，向伦敦市民真诚表示，如果当选为市长，会在应对恐怖极端主义的问题上扮演特殊角色。正如他2015年11月在英国议会发言中所述：“穆斯林在解决极端主义问题应发挥特殊作用，不仅因为我们比其他族群更有责任，更加因为我们被错误地标签化了。”在处理穆斯林的标签化问题上，萨迪克不断地使其正向化，收到了很好的成效。

汲取工党大选教训

随着2015年5月7日工党在英国大选中的再次惨败，党魁爱德·米利班德宣布辞职，随后工党内部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无人看好的科尔宾后发制人，一举成为工党领袖。萨迪克在工党内部作为伦敦市长候选人成功胜出后，很好地反思了工党大选的教训，走向“中间阵地”（Central Ground），吸纳包容不同意识形态的分歧，更加务实地向所有伦敦人伸出橄榄枝。在争取对象上，萨迪克并没有像爱德·米利班德和科尔宾那样运用“35%策略”，即只争取政党的铁杆粉丝，从实际效果来看，这样做使工党退回了老路，再次在大选中失利。萨迪克在伦敦各区中对具有“托利倾向”的选民投入了很大的精力，收到了成效。同时，萨迪克与科尔宾还保持一定的距离，批评其不唱英国“国歌”，告之工党“反对犹太人”对于自身形象的损害。在政策上，萨迪克提出将营造一个更加友善和低税收的商业环境，支持企业家发展，反对工党曾经提出的“50%税收”的政策。



亲民务实、草根形象的竞选策略

英国著名的民意调查机构YouGov报告称，在选民对工党和保守党两位候选人的印象中，萨迪克被认为较关心民众、可信、有原则，而戈德·史密斯被认为不接地气、狡猾、无趣、有野心。萨迪克出生在草根阶层，完全依靠自身努力取得了今天的成就，相反，身高1.90米、就读贵族学校伊顿公学、继承了父亲两三亿英镑遗产、还娶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的保守党候选人扎克，属于典型的“上流社会”。源于其不同的出身，两位候选人所展现出来的竞争策略和风格形成鲜明对比。萨迪克更加具有亲民务实草根气质，而扎克则显示出脱离群众的富豪气质。在扎克和萨迪克竞选期间，BBC对两位候选人进行了一个暗访跟踪。扎克自称经常坐地铁出行，但却不知道哪条线路是伦敦最重要的地铁线。更让伦敦市民不能理解的是，他还为自己的无知辩护。萨迪克则非常准确地回答了他生活中的常识问题，显得既轻松又自然。此外，扎克还在萨迪克的穆斯林问题上，咄咄逼人，有点粗鲁地攻击谩骂萨迪克。保守党的党内高层们都气愤耻笑扎克愚蠢至极。可想而知，作为一位伦敦的普通选民，是选择一个一身富豪气质的人做市长，还是选择一个每天乘坐地铁上下班，对普通市民的生活疾苦感同身受的人做市长？答案一目了然。

稳健的公共政策方案

伦敦市长不是一个全能的岗位，他有着明确的定位和职责，主要功能在于治理交通，宣传文化，招商引资，关心伦敦人民基本生活，以及当好伦敦代言人这几项职责。因此，历次伦敦市长大选的候选者们皆围绕以上问题形成自己竞选的公共政策方案。仔细分析，很难发现能有什么特别突出、与众不同的亮点。所以，笔者认为，萨迪克稳健的公共政策方案至少没有给萨迪克在竞选中失分。他的施政纲领可以概括为：降低与严控伦敦人民的生活成本，让伦敦人居有其所，安居乐业，实现更好的个人发展，进而促进社会流动，也让伦敦更有竞争性、更有活力与创新力，支持英国继续留在欧盟内部，反对脱欧。相反，扎克的政策方案则让选民们多少觉得有点“不食人间烟火”，太不了解实际情况。比如，提出交通费用在4年里要上涨17%，伦敦市民可负担的房屋价格的上限界定为每套45万英镑（这是不少伦敦市民无法负担的价格）。这样来看，选择扎克就意味着继续固化本已僵化的社会阶层流动性。

争取少数族裔的选票

历届伦敦市长选举到最后关头，选票走向最不确定的，就是在选民中占比很大的外来族裔选票，候选人想要更大程度地争取选票，都使出招数在各个渠道宣传对外来族裔利好的政纲。萨迪克在争取少数族裔方面下足了功夫。比如，在针对英国是否脱欧这个关键问题上，萨迪克明确支持工党的态度，反对脱欧。比如，据媒体报道，在伦敦工作4年的波兰人Bronislaw在5月5日的伦敦市长选举投票中明确支持工党候选人萨迪克，因为波兰是允许双重国籍的国家，而根据欧洲法律规定，不间断地在英国居住5年的欧洲经济区国家公民及其家庭成员获得永久居留权。而英国一旦脱欧，很多在英国工作少于5年的波兰公民将面临签证问题。此外，在关注少数族裔的基本福利保障上，更加关注外来移民的根本利益。争取到少数族裔总票最终使萨迪克一举登上了伦敦市长宝座。

静观日本『知华』大使言行

□ 侯隽

5月15日，日本著名“知华派”外交官横井裕出任驻华大使，引发外界诸多期待。“知华派”的头衔，使得外界对其改善长期陷入低迷的中日双边关系有着很高的期待。客观来说，“知华派”人士出任驻华大使，将有助于中日双方加强协调与沟通，对中日双边关系来说是好事，但不能就此有不切实际的过高期待，应客观看待新任驻华大使的作用，中日能否从根本上改善关系取决于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新大使上任后的中日关系走向仍有待观察。

“知华”大使上任，体现日本意识到了对华外交的重要性。此次横井裕的走马上任是继2010年宫本雄二卸任驻华大使之后的又一名“知华派”人士出任驻华大使，体现了日本政府对于加强对华外交，准确把脉中日关系的考量。自2010年以来，日本驻华大使先后经历了丹羽宇一郎、木寺昌人等非“知华派”人士，但从中日关系实践来看，中日双边关系在这一时段处于不断恶化之中，虽不能简单归咎为大使个人因素，但此番“知华派”出任驻华大使，体现了日本政府有寄希望于“知华派”外交人士改善中日关系、加强对华外交的沟通与协调的意味。

“知华”不等同于“亲华”。横井裕具有长期对华外交工作经验，履历丰富，曾出任驻上海总领事与驻华公使，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说其是“知华派”不为过，但“知华”并不等于“亲华”。近些年来，日本政治右倾化愈发严重，“知华派”外交人士往往受到“标签化”对待，被右倾势力看作是“亲华”势力的代表，在开展对华外交时这些人往往不被信任，被认为对华态度过于友好，从过去六年间驻华大使的任命上便可看出一丝端倪，无论是丹羽宇一郎还是木寺昌人，都不是所谓的“知华派”外交官。一国大使作为派驻邦交国的最高代表，其个人意愿并不能代表国家意志，往往受到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利益所限制，要服从于国家总体对外政策。横井裕作为安倍政府所任命的驻外大使同样也不例外，不能因自身特殊的涉华外交工作背景就可以将其简单地归结为“亲华”人士，对于其在中日关系缓和上所起的作用应该理性客观看待。

新任大使的行为选择受制于安倍政权整体对华政策。安倍政权对华采取的敌意外交政策从整体上对于涉华外交人员来说无异于“天花板”，任何外交人员都要在国家整体政策下开展外交行为。日本对华外交政策的欺骗性就在于说一套做一套，一方面声称要维护中日友好关系，实际上却在不断做着伤害中日关系的事。自从2012年底安倍上台以来，日本政治右倾化对于中日关系发展的毒害作用愈发明显，安倍政府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政策，加强美日同盟，充当反华急先锋，不断在历史与领土问题上挑衅中国，扩充军备，推动新安保法的通过，拉拢南海争端当事国，在南海问题上推波助澜，并在国际社会不断抹黑中国，凡此种种行为已经严重伤害到了中日关系发展的根基。从现实来看，安倍政权在推行反华外交上并未有所收敛，今后中日关系前景仍然不乐观。就在横井裕上任的当天，在回答记者关于历史问题与南海等问题的提问时，也仅仅是表示这些问题不应成为中日关系发展的障碍，没有正面回应中国一直以来要求日本停止插手南海问题的呼声，横亘在中日关系之中的诸多现实矛盾依然存在，不是简单的所谓一任“知华派”大使所能化解。

新任驻华大使的作用更多地会体现在安倍政权更为准确把脉中国，掌握涉华外交信息方面，如果安倍政权不放弃对华敌视政策，对于新大使有效改善中日关系不应抱有过高期待。过去几年间的几任驻华大使的任期也恰恰是中日关系动荡大幅退步时期，新大使任上的中日关系发展走向仍将充满变数，中国坚持对日友好的原则始终未变，一切都取决于安倍政权是否能够切实采取对华友好的外交政策，否则横井裕大使难免同前任驻华大使一样陷入安倍政权对华外交“灭火队员”的窘境。

时　评

环球瞭望

拉美左翼发展韧性及其根源

□ 靳呈伟

当前，拉美国家的一些左翼政府面临不少困难和严峻挑战，甚至有的左翼执政党在选举中失利，交出了政权。于是出现了“拉美左翼终结”的论调，认为拉美左翼终结，就像将20世纪末21世纪初左翼在拉美多国纷纷上台执政视为“拉美山河一片红”“美国后院赤焰熏天”一样，都有夸大的成分在里面，失之武断与片面，实不足取。如果放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里，综合多方面因素看，可以说，拉美左翼的发展具有相当的韧性，不会因一时的困难而终结。

拉美左翼发展韧性的主要表现

拉美左翼的发展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其中既有困难期，也有多次快速发展期。早在19世纪中叶，社会主义就开始传入拉丁美洲；19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墨西哥、智利、巴西和乌拉圭等国出现了政治性较强的工人组织；20世纪初，出现工人阶级政党。可以说，拉美是继西欧之后较早出现共产主义运动、建立共产主义政党的地区。拉美左翼在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不少困难时刻，但也有多次快速发展期。譬如，20世纪初工人阶级政党兴起，20世纪六七十年代民主主义政党快速发展和影响力急剧增长，20世纪末21世纪初左翼在多国执政，等等。

拉美左翼有着较为丰富的同各种敌对势力斗争甚至面对打压的经历，斗争经验相对丰富，抗击打能力相对较强。拉美地区的共产主义政党曾长期遭遇白色恐怖，一些左翼政府曾遭遇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夹击乃至军事政变的颠覆。面对这些打压，虽然一些左翼政党改弦易辙，但更多左翼政党坚持了下来，并积累了斗争经验，锻炼了抗击打能力。

拉美左翼流派众多，阵营庞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多样性。国内外学界根据不同标准对拉美左翼的流派进行了划分。有的将拉美左翼分为温和左翼与激进左翼，有的分为原教旨主义左翼、民众主义左翼及改良主义左翼，等等。一直以来，没有一个为大家所认可的关于拉美左翼的界定，可能与拉美左翼流派众多，很难用一个标准一以贯之地加以涵盖有关系。拉美地区这些不同流派的左翼，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不同探索，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

逐步成为一种替代或选择。许多拉美左翼高举“替代”的旗帜（如替代资本主义、替代新自由主义，等等），致力于探索不同的发展模式或发展道路，希望成为一种不同的选择。在代议制民主框架体制下，尤其是第三波民主浪潮以来，拉美左翼纷纷通过选举上台，成为一种替代或选择。

不同时期左翼在拉美各国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虽有起伏，但却确确实实地发挥了不容抹杀的重要作用。例如，有的学者认为拉美的政治变迁与左翼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左翼是拉美政治变迁的重要推动力量，不仅成为民主化进程的积极维护者，也成为转变发展观念的主要倡导者，以及地区新政治格局的积极塑造者。另外，左翼在拉美政治社会生活中发挥影响力的方式多样，并非执政一种。非执政的左翼可以借助议会、社会组织、社会运动等发挥影响。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许多非执政的民主主义政党、民族主义政党在各自国家的议会中扮演重要角色，发挥着重要作用。阿根廷正义党虽然因去年选举的失利交出了总统宝座，但依然在参众两院占据多数，且在一半的省和不少市掌权，执政地位的丧失并不必然意味着影响力的丧失。

拉美左翼发展韧性的根源

内部因素。思想理论的包容性、本土性、时代性。历史上，一些拉美传统左翼政党曾面临教条主义的困扰，但经过反思，他们开始强调思想的包容性、本土性、时代性。而多数新兴的左翼一开始就比较注意反对教条主义，强调革新和减少原教旨主义成分，其思想理论具有一定的包容性、本土性、时代性。具有包容性、本土性、时代性的思想理论，为拉美左翼不断崛起提供了理论基础。

政策的务实性、灵活性。拉美左翼注意政策的务实性、灵活性的情况与注意思想理论的包容性、本土性、时代性类似。务实、灵活的政策，为拉美左翼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组织形式或组织载体的多样性。拉美左翼的组织形式或载体有政党、社会组织、社会运动等。一些左翼政党重视借助外围组织，一些左翼的社会运动性质特别明显。多样的组织形式使拉美左翼在组织载体方面具有相当的韧性。譬如，许多拉美国家的共产党在被宣布为非法、被取缔的时候，往往通过外围组织发挥作用。

重视塑造领导人形象，充分发挥魅力型领袖的作用。家长制作风、个人主义等是拉美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因子。拉美左翼重视塑造领导人形象并充分发挥魅力型领袖的作用可谓是契合拉美文化的基因。

执政的拉美左翼重视社会公平问题，并在社会领域取得显著成绩。一般而言，左翼倾向于优先关注社会公平。无论是古巴共产党，还是20世纪末以来上台执政的拉美左翼政府，在社会领域多取得明显成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重视有效动员和引导民众参与，一些左翼本身具有鲜明的草根性。重视动员民众，鼓励并引导民众参与，为拉美左翼不断崛起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外部因素。经济领域。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拉美地区逐步发展形成一种资本主义生存方式居优的多元混合型生产方式结构。生产方式的多元并存导致利益的多样性，多元利益诉求需要通过丰富多样的代表或代理人表达。尤其是中下层的利益诉求主要通过左翼表达，因而为左翼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现实需求。

社会领域。多元生产方式导致拉美阶级结构的多元化，有的学者认为拉美出现社会异质性或碎片化趋势。长期以来，拉美左翼主要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妇女和小资产阶级等为社会基础，社会基础相对稳定。一些左翼还注意面向非正规经济部门的边缘化群体，使其社会基础的范围有所扩大。另外，社会不平等、两极分化、贫困等众多社会问题长期困扰拉美地区，左翼优先关注社会公平问题正好与解决相应社会问题的需求相契合。

政治领域。一般而言，利益诉求的多样性在政治领域会体现为政治主体的丰富性，不仅会有右翼，也会有左翼。在上个世纪，拉美业已出现左右翼共存、共治的局面。第三波民主浪潮以来，拉美地区的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为左翼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政治氛围，为其在政治生活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提供了舞台。左翼纷纷获得合法身份，成为“体制内政党”，成为各国政治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有学者认为，进入21世纪，左右翼共存和竞争逐渐成为拉美国家政治的常态。

文化领域。拉美的政治思潮林林总总、纷繁复杂，其中社会主义思潮是基本政治思潮之一。拉美的社会主义思潮不仅源远流长，而且种类众多，这为拉美左翼的发展提供了充足养料。

自然资源。国外有学者对18个拉美主要国家1975至2007年间的100次选举样本进行了研究，认为农产品、矿产品、石油产品繁荣与一国出现来自中左政党的总统呈显著正相关。